

中 央 研 究 院
三 民 主 義 研 究 所

專 題 選 刊

(五十三)

觀念，三民主義思想與臺灣之經濟發展

費 景 漢

中 華 民 國

臺 灣 臺 北 南 港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六 月

觀念，三民主義思想與臺灣之經濟發展

費 景 漢

導 言

臺灣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從早期的「進口替代時期」（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二年）進化到晚近之「出口導向時期」（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八〇年）是一個爲人所熟知的演變，這個演化可以用各種統計資料說明。例如：平均國民所得、貿易、儲蓄、投資、生產力以及農業、非農業部門之勞動力就業比重等等。這種演進帶來生活素質的提高，也可以用所得分配的平均度、識字率、教育普及率、國民平均壽命、健康指標與消費數量（例如：每千人之電話、電視機具數等）來衡量。隱含在這些「數字」和「指標」背後的，是三十年來（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〇年）一千多萬人民的「生活方式」的變遷。可是，這種大時代的變遷並不能完全用數字來描述，因爲還有「意識型態」也就是「觀念」的轉變。

我們在探討意識型態的問題時，首先要問：「意識型態」和生活方式的巨變到底有沒有關係？有一些「現實主義」的人，也許認爲「觀念」和「思想」是那麼抽象和空洞，一定不會和生活方式的轉變有什麼密切的關係。對這種玩世不恭缺乏幻

想的人，我們最好請他讀凱因斯在「一般理論」中結尾的幾句話：

「……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觀念，無論他們是「對」或者是「錯」，都具有普通人難以想像的影響力。說實話，只有極少的別的「東西」能夠主宰我們的世界，有些自命不凡的人以為他們自己從沒有受過學術理論的影響，而其實這些所謂「經驗主義」者，往往是一些已經死去的經濟學家的奴隸。有一些瘋狂的政治領袖以上帝代言人的身份說出許多教條，而這些金科玉律無非是他拾人牙慧的讀了一點過時的教科書而產生的狂想。我相信如果拿「觀念」對我們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來對比，既得權益的「勢力」，未免過於為世人所誇大。觀念的力量，往往不能馬上可以看出來，而總得經過一段時間以後才能流露出來；因為經濟學和政治哲學方面的知識，年齡超過二十五或三十歲，而仍能受新理論影響的人並不太多。所以政府首長、公教人員、立法代表、甚至「煽惑專家」們對於當前問題所發表言論的理論依據，絕不可能是最新的。無論「好」「壞」，觀念始終將比既得利益更具高度的危險性。」

因此，根據凱因斯的說法，意識型態幾乎是無所不能和無所不在的控制我們，「好的」觀念會促進我們的發展，「壞的」對我們就有妨礙，可是無論「好」「壞」都嚴重的影響臺灣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經濟發展的型態。

分析「思想」和經濟發展的關係時，最重要的是必須由歷史發展的觀點先瞭解臺灣過去三十年經濟發展的特徵。當代許多開發中國家，都從戰前的農業傳統中，在戰後（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〇年）經過一段「過渡成長」的時期，逐漸邁入「現代的成長紀元」。意識型態在這一變遷過程中扮演著極特殊的角色，這就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

我認為意識型態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就是一個國家的傳統文化特徵、價值觀念。這種傳統觀念可以有助於「現代化」，但是也可以成為「現代化」之阻力。我們要證明的是，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完全符合現代化的要求（第一節）。第二類就是

一國的政黨所標榜的具有權威性的主義。比如國民黨在臺灣所施行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標榜的共產主義就是典型的例子。主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過渡生長過程中，決定了經濟制度或組織方法的特徵（第二節）。最後一類就是所謂知識份子之意見，它對於經濟發展政策的形成有極大的影響力（第三節）。

分析意識型態的困難處並不僅僅因為意識型態本身的分歧和廣泛。困難的是在我們必須討論兩種問題才能勉強的使我們的討論有一點深度。第一種問題是探討思想的「起源」。以主義來說，我們可以不假思索的說，孫中山先生是三民主義，馬克斯是共產主義的創始人。但是辨認「傳統文化特徵」和「知識分子意見」的「起源」就很麻煩，不是我所能勝任。第二種問題是：一種思想的價值，必須和其他思想相互比較才能正確的評估，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的對比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基於這些困難，我自己深深感到本文是一篇膚淺的文章，僅能粗枝大葉的談一點「印象」。我必須把本文的焦點擺在意識型態和成長變遷這個狹窄的主題上。我真不知道應不應該「感謝」本次學術會議的主辦單位給我一個獻醜的機會。

第一節 傳統價值與現代成長

現代經濟成長

十八世紀後半葉，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開啓了一個經濟成長新紀元。顧志耐（Simon Kuznets）教授稱之為「現代成長紀元」（epoch of modern growth），到現在為止，這種生長只有「短暫」的兩百年歷史（一七八〇年至一九八〇年），並且有很明顯的特徵和工業革命前的幾世紀的農業社會生長大不相同。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現代化的經濟成長帶來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工業革命以前的生長可以追溯到「定居式農業」（Settled Agricultural）的古代文明（即：埃及、中國、美索布達米亞）下的生活方式。這種古老的生活方式在地球上起碼延續了有八千年之久，現代生長紀元很明顯的「劃時代創新」就是人類學會了習慣性的運用科學、技術去影響工業和農業的生產藝術。使人類第一次瞭解單憑自己的能力，就有連

續不斷的提高生產力和增加全社會物質福利的可能性。現代化的生長就是「科技時代」的生長。

顧志耐教授的經典之作的名字是「現代經濟成長——成長率、結構和擴散」(Modern Economic Growth-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這書名的標題指出現代經濟成長的基本特色：也就是「生長的速度出奇的快」。人口成長率、資本累積率與每人平均所得之增加率等都長的快，和「結構劇烈變遷」比如農業部門就業比重之降低。這些都是能以統計數字可以度量的現象，顧志耐教授就這樣「恆量」而得到諾貝爾獎。但是對我要討論的主題來說，我必須強調的是，現代成長的那種如火燎原似的擴散蔓延的現象(Spread)，在十九世紀初期從西歐到北美，又在十九世紀末葉傳到德國、加拿大及日本，更在二十世紀初期，傳至東歐和蘇聯。這種傳播的過程最後輪到當代的開發國家。中國，包括臺灣和大陸，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經濟發展，不過是現代成長在東亞地區繼續的擴散、蔓延到日本以外的亞洲區。近代化的生長「觀念」在英國開始以後，一直蔓延到世界各地，臺灣現在的生活型態和鴉片戰爭以前大不相同，主要是因為近代化的生長「觀念」的蔓延。

傳統思想與現代成長

從「比較歷史」的觀點來看，現代化的成長是從傳統的農業社會演變而來的。但各地區受這「觀念」的感染，有個「先來」「後到」的區別，問題自然出在傳統社會的意識型態(文化特徵與價值觀)是不是有助於現代成長的降臨。對這個問題，顧志耐教授在他書裏表示幾點意見：

「傳統文化有利於現代經濟紀元降臨的因素，可以用三個名詞來概括：現世主義(Secularism)、平等主義(Equalitarianism)、和民族或國家主義(Nationalism)。所謂現世主義，就是全社會把注意力集中在現實生活而不認為「浮生若夢」，而把希望寄託在「來生」的天國。並且在注意現世生活時，特別強調經濟方面的成就。如果傳統文化阻礙大眾職

業自由選擇、自由追求經濟利益就有反現世主義的傾向。

平等主義，則是否定人類一切的「世襲」的差異，除非這些差異能在人類的活動中表現出貢獻。平等主義相信的是這種貢獻決定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這樣就會使更多的人力資源（天才和努力）投入經濟成長的行列，而不在其他非經濟性的活動上浪費。

民族主義是「社會感情」團結的表現，這種感情導源於共同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於是每個人都能對一個「大團體」和「國家」效忠，甚至可以對「外國」發生對立的感覺。……在現代經濟成長的時期，國家和民族主義的傾向是非常明顯的事。」

現世主義、平等主義和現代成長的相輔相承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現代成長的「最終產物」（也就是連續不斷地增加物質福利）不受重視，或是很多有創造力的人羣被剝奪了在這方面公平的表現機會，現代化的成長自然會受到阻礙。在民族主義的號召之下，效忠團體的精神使全社會容易的接受犧牲，取得一致性的對外政策（例如臺灣限制進口，課徵關稅），而且在國內因為「同種同文同軌同倫」「文化相似」「彼此熟悉」，能使各成員團體很容易的達成「經濟契約」的協議（例如：香港的繁榮就不能說他受極端狂熱的對外民族主義的影響）。

中國傳統價值觀念

我們中國人心目中自己認為我國文化特徵包括二倫、三綱五常、四維、八德種種「美德」。其實從比較文化的觀點，西方的歷史學者沒那麼「客氣」，經常客觀的把傳統中國的文化特徵歸納成以下四點：(一)特有的士大夫階級；(二)具有社會導向的政治哲學；(三)「一統帝國」的政治理想；(四)擴張式的「家族制度」。這些文化特徵，可以用顧志耐教授所提出的三個標準來作個評估，以鑒定我國傳統文化是否有利於現代化的生長。

在所有的傳統社會裏，平等主義，首先反映在他的階級性質和階級流動性，在

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裏，土地所有權是區分社會階級的主要標準。也就是包括上層的地主階級，和下層的無產佃農階級，用以維持社會的「聲望」「地位」和社會秩序，孔子充分了解這種需要，所以提出「禮」的觀念。禮就是「適當的階級性的行為標準」。每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中，都有這樣的階級結構，毫無例外。孔子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正式肯定這種制度的理性，可以說是中國所獨有的文化特色。

利用土地所有權來劃分的階級制度，往往受到別的社會制度的影響而喪失階級流動性，例如世襲的宗教規定（如印度）、血族關係（如日本）、兵衛或武士（如古代中國）的世襲，使階級分野加強，會產生不合理的或不符合平等精神的階級流動障礙。中國傳統階級結構的最大特色，在於它利用教育作階級分野的標準，去時時重新調整各階級的成員，最上層的是受教育的佔有土地的士大夫階級。而下層的佃農的子弟也可以由取得教育為手段而得到土地成為士大夫。在這個制度之下，每個人都可以為了想提高社會地位而追求教育，並沒有法律或觀念上的阻礙。平等主義，從高度社會階級流動來看，在中國真是極為明顯，可以從唐代以降，以至當前的考試制度上看的出來。如果教育是一個基於科學與技術的現代社會的基礎，那麼中國傳統社會的階級結構下的公平競爭的教育制度早已給現代化之發展做了充份的準備，中國這種階級制度在世界各主要文化中實在是獨一無二的。

至於中國文化的現世主義色彩可以追溯到儒墨、道法這些主要的思想流派，在先秦的學術文化黃金盛世，這些學派的共同思想就是如何在「今世」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絕少浪費時間去思考有關「鬼神」的「來世」問題。如果撇開中國悠久的歷史不談，就會發現人類歷史中其他的重要文化，幾乎都是浸淫在無休無止的宗教爭執和宗教戰爭之中。現在在中東還打個沒完沒了，現世哲學觀下的中國人變得非常的實際，關心現世的事務，為了求生存，小心翼翼的處理有關日常生活的細節，因此，除了中國人是「最現世的」這個理由以外，我們簡直無法解釋這麼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怎麼能夠適應地球上各種自然環境而成為擁有最多人口的民族？

中國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為公之大帝國」，從漢朝開

始建立許多制度（法律、軍事、考試制度、行政、經濟等）歷經兩千多年的考驗一直流傳至晚清。與其他文化比較起來，中國是最具有歷史觀念的民族，我們深刻的察覺到民胞物與之愛，並且善於保存歷史文獻。根據顧志耐教授的說法：民族主義就是「社會感情的要求，乃是由共同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所促成的」，那麼有意識的歷史感，無疑是中國文明的主要特徵。

由此可知中國的傳統理會和價值觀，若從現世主義、平等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觀點來看，是完全符合現代成長的要求。中華民族的傳統智慧可能是當前低度開發國家中，最適合現代成長的民族，而臺灣過去卅年成功的發展經驗正足以證明這種理論。

第二節 「主義」與過渡時期之成長

第一次大戰後開發國家過渡時期之成長只有很短暫的歷史。這種成長一方面是農業殖民時代的結束，而同時也是現代化的開始。「過渡」的意義說明了「成長法則」很不穩定時時更變，逐步演化。許多新的制度（工業組織、金融制度、財稅制度、進出口管制等等）在過渡時期逐步建立。「主義」之所以和卅年來的成長息息相關，主要是因為它給過渡時期制度建立提供了基本指針。

一套由官方正式支持的「主義」，描繪出一個理想社會的遠景的輪廓，這種遠景永遠有一點「革命性」的理想成份。各種主義之不同在於如何制定調和「個人」和「社會」兩者利益的最佳方案，使人互相關心。主義的理想，透過政黨提出的明確黨綱加以執行。三民主義是革命家 國父所倡導，在臺灣由國民黨執行。大陸的共產黨以更緊密的黨組織來實行共產主義革命。臺灣和大陸這兩種不同的革命方式隔海對立，說明了「主義」的確能使過渡時期的成長採取迥然不同的社會組織方式也得到不同的生長成果。

中國大陸的共黨革命

我們要討論共產黨的組織方法，最好是想到一支馬戲團中的烏魚，這支受過訓練的「烏魚」能在頭上頂著一本聖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且能用它的「手」（黨支部的幹部）指舞著無數汽球（學校、工場、鄰居組織的單位）裏面裝滿了螞蟻（每個單位裏面的羣衆），以「馬列主義」爲最高指導原則，由幹部領導羣衆進行革命，共產黨對「互相關心」最基本的解釋，不僅強調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的紀律，並且「互相負責共同批判」，以使「思想統一」，不許人有絲毫的自尊和自愛，需求的不只是一心一德而是情緒一致，人格看齊，就好像人類生的是螞蟻的遺傳因子。共產黨這種組織方法，的確有它的優點，因爲他的輸灌思想的「政治工作」特別有效，並能強調「國家」的目的，現代成長的初期所需要三大經濟功能也可以輕易達成。這第一它是一個有效的勞工動員的制度，促進勞動參與率，組織勞工從事於生產社會結構式的投資。（例如：道路、灌溉系統之修築、清掃城市街道、消滅蚊蟲、普及教育等），能實現大規模生產的經濟效益，而能達到在其它社會中唯有軍隊才能達到的效率。另一個優點是厲行節約，把消費維持在最低的水準，並且能抑制人口成長率，共產黨用的辦法是藉重「單位」內的羣衆「鬥爭」。

在這樣的烏魚體制之下，勞動力動員、節約消費和人口控制等三大經濟任務的效率遠超過任何其他社會制度。共產制度的優點，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七年間充份表現，經濟發展的確給人深刻的印象，不幸的是那時共產黨的「勞工價值說」使他們昏了頭，沒有及早注意節制人口上昇，否則共產黨早期的黃金時期，可以延長很多年。

在戰後早期的著述中，認爲上述三項經濟任務是「起飛」的關鍵，然而在現代化的經濟成長過程中，顧志耐教授告訴我們科學和技術早晚會變成發展的關鍵。那三件事成爲「次要」的事。

共產黨是否能夠順利達成「科技現代化」？我們可以用顧志耐教授的三個尺度

——國家主義、平等主義、和現世主義——去衡量一下。民族主義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因為共產黨痛恨一切傳統價值，就好像在二十世紀一個外來的觀念（馬克斯主義）沒有侵襲以前，中國人渡過了三、四千年的文化真空的野蠻生活！這種自我貶值的論調，實在十分可笑！但是我們笑不出來，因為這是一個悲劇，何況臺灣的經驗告訴我們，傳統中國文化和現代化的需要，一點兒也不衝突！

顧志耐教授指明現世主義的特質是「在社會容許的尺度下，允許個人選擇職業，以及追求經濟利益的自由」，中國傳統文化中本來鼓勵這種競爭上進的精神，可是共產黨治下的螞蟻把一切人類的自尊自愛當作罪惡，共產黨本來不是一種宗教，可是有一個權力瘋狂的人「以上帝代言人的身份說了許多教條」，硬說「自愛是罪惡」，於是那烏魚立刻揮舞他的萬靈的手使單位內的羣衆對這瘋狂的人的「玉照」清晨三叩首，早晚一爐香。我常懷疑共產黨和羣衆接近的中下級幹部是不是真相信，使用暴力就可使現實的中國人盲從？這種摩登的迷信，把中國人的傳統自由一網打盡。

平等主義是指機會平等，顧志耐教授說它能「吸引更多的才能和精力於經濟發展，以免在其他方面浪費」。而共產黨妄想用階級鬥爭的暴力去更改人性，不知道浪費了多少人的時間精力。

在實驗過程中，科學技術在一國生根需要「知識和意見」在知識份子間，並且在知識份子和工商企業界間，自由交流以發掘科技知識的前線。科學技術的發掘，注重的是一種試驗和容忍的精神，這種尋求真理的精神似乎和共產黨的「烏魚精神」有點格格不入。

現在共黨領袖公開承認三大信仰危機：即信仰危機（對馬列主義）、信任危機（對黨幹部的領導）和信心危機（對宣佈太遲的四個現代化）來一筆勾銷卅年來於馬克斯主義旗幟下所造成的混亂與人力的浪費的一篇爛帳，任何重建制度的努力都必需宰割那條「烏魚」。有人認為中下階級幹部會抵制這種改革，因為改革勢必要奪去他們的唯一重大資產——就是無比的權力和特權。但是我不以為然，因為我同

意凱恩斯的看法「既得權益的力量和觀念的潛移默化比較起來，未免太爲人所誇張了」。事實上，「三大危機」無非是觀念改變的開始，這種觀念的改變正在威脅著共產主義，是它破滅和死亡的預兆。

三民主義在臺灣

孫中山先生在撰寫三民主義時，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中國的現代化勢在必行。國父主張現代化的民主政治改革，並且強調基於國家主義的世界，各國應當和諧的共存。在經濟方面，國父看到農業社會的土地所有權不平均乃是現代化生產的阻力，而且體會到工業結構中國營事業可以占適當的比重。國父看到社會基本投資之重要，在心胸裏繪出一幅藍圖，把幅員廣大的我國疆土用鐵路、河流和港口連接的一種雄偉的工業大國的氣派。用這種寫實的鏡頭對我們作長期遠景的鼓舞，充份的顯示我國的現實主義的傾向和國父的明哲。然而最令人驚異的是，這些雄大的構想都遠在六、七十年前已經完成。

就現代化而言，三民主義完全符合中國傳統價值觀念。在現代化的生長過程中，我國的家庭觀念就有很積極的社會經濟功能的含意，在人口趨向都市化、職業化、地域高度流動化的現代社會中，許多社會經濟任務，像社會保險、儲蓄和融資、教育、護理與保健……，本來就能很方便的通過傳統的家族系統而獲得解決。和共產黨在大陸浪費許多時間和精力於破壞家族制度相比較，顯出國民黨「固守倫常」的智慧。

三民主義中對「社會關心」的解釋似乎是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隨著時代變遷，這些主張也隨著社會輿論對經濟成長的要求，漸漸有了新的政策性詮釋。早年的土地改革轉變成當前鼓勵土地重劃、聯合經營。因爲「聯合經營」多少有一點耕者「無」其田的意味，於是三民主義理論家一定會採行一種「三民主義進化論」把「土地利用制度改革」和早期的「土地占有制度改革」相提並論。公營事業過去、現在和將來都能開放民營，這些措施不是對國父思想，陰謀反叛的「修正主義」，更

重要的是國民黨並不把民生主義當作不許人討論的「教條」「語錄」，而是常從實用主義的觀念來作彈性的詮釋。共產黨從國民黨學到這個真理，最近才說「我不管『紅貓』、黃貓，我要個能捉老鼠的貓」。因為「三個信仰的危機」，也許共產黨早晚會承認最會捉老鼠的貓是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下的經濟組織，完全肯定在一個平等而受市場制度協調的自由社會中，個人的前衝的創造力可以充份的激發。凱恩斯這樣說：「我相信所得和財富的不平均，有『社會』和『心理』上的正當理由，雖然像今天所見到的不平均，也許有點『過度』。好些有價值的人類活動其果實的豐收需要私有財產制度所創造的環境下的賺錢動機。而且賺錢機會和私有財富的存在，可以使人類危險的劣根性在比較沒有害處的活動上發洩。如果我們不用這種方法叫這種人性得到滿足，它們會使人更殘酷的、不擇手段的去追求個人權勢，以滿足自己的誇大狂。與其讓一個人去對他的同胞殘暴，不如讓他去對他自己的銀行存款帳戶殘暴。雖然有人認為後一種方式無非是達到前一種方式的手段，但是它也可以『代替』前一種發洩的方式。」（一般理論，374頁）

他這段四十多年前所講的話，對當前問題之洞察是多麼的恰當而貼切！對人性和社會關係的瞭解及對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的對比，有多麼清楚的認識。我們現在雖然懷疑凱恩斯自己的貨幣利率理論，但是我們想到國父的遺囑——余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尤其在我們和共產主義隔海對抗時，我們多麼懷念凱恩斯這個熱愛自由的人。

第三節 知識份子的觀念和成長

知識份子觀念

「主義倡導者」在字典上的定義是「一個空想的，不切實際的政治理論家，或是一個理論化而沒有充分考慮實務的人」。在「四人幫」失勢以後，美國報紙上有一個卡通漫畫。「四人」垂頭喪氣的坐在監牢裏，標題是「哎！毛語錄怎麼沒教導

我們如何越獄逃走？」原來理論和教條講的是原則，不管實務細節。經濟發展的實際政策問題，例如：匯率、關稅和進口配額如何調整，利率、租稅如何訂定……等等。如果想在三民主義或 國父的其他著作中尋找答案的話，一定也會緣木求魚遭遇到困難。其實那些耗費決策當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時間和精力的問題，往往在「主義」裏找不到答案。這些主義「管不着」的政策措施，對於最近卅年臺灣經濟的發展過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影響政策措施的是另外一種觀念。

過渡性成長是一個演化過程而有演化的階段性。例如臺灣的「出口擴張時期」是從「進口替代時期」演化而來的。這種階段性的演化，必然涉及許多政策的改革，例如臺灣和南韓、貶值和利率自由化等，啓發了出口導向階段，但是隨之而來的却是：工資上漲、勞動力短缺等新問題，逼着我們必須朝向一個更新的階段演變以注重人力的有效運用和科技發展。回憶過去在進口替代時期，我們從前的問題是失業、美援、外匯短缺與糧食自足。這些當時認為最嚴重的經濟問題，現在想起來正如昨日黃花，恍如隔世，「主義」和「傳統價值」都不足以應付這些瞬息萬變的經濟發展政策問題。

經濟發展性政策的採納取決於知識份子的意見，這些學有所長的「知識份子」包括政府首長決策當局、學者、經濟學家。在一個民主社會體中，他們的見解，經由記者和大眾傳播媒介的宣揚而成爲公眾的意見，因而決定了發展策略和有關的政策。這不是訴諸「情緒」的教條或傳統價值的觀念，而是訴諸理智和思考以後而得的智慧，往往是常識和經濟理論的結晶。

自由市場或政府管制

經濟學家的意見的「分歧性」和「不一致性」是鼎鼎有名的。在許多低度開發國家中，包括過去和現在的臺灣，意見上爭執最多的是：在一個市場制度下，政府管制的功效到底有多大？於是就出現兩個「陣營」的對抗，一個是受過訓練的專業經濟學家，他們主張的自由化的觀念，可溯源到亞當斯密，這是「自由陣線」。另

外有一條「官方陣線」，是由一些最受人尊敬，有管理經驗的政府高級官員所組成。好像兩個陣營的意見永遠處於「爭鬥」的局面。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民國七十年八月四日在臺灣經濟研究所的「中華民國經濟與金融機構自由化」研討會上，二十位參與會議的經濟學家在一份一致署名的「宣言」上，開頭就說：

「我們一致的結論是，『計劃性的自由經濟』是，八十年代的最佳制度。由於工業結構之轉變，問題的複雜性使得政府不再能經由管制，一一有效的加以解決。『計劃性自由經濟』首要之道在建立自由的市場制度，經由長、短期措施解除政府的干預。」

這份宣言並建議政府從四個方向著手：(一)銀行體系和金融機構的自由化；(二)外匯制度自由化；(三)租稅制度自由化；(四)公營事業自由化。他們在現階段，干預現象瀰漫時所作的建議無非是希望能有一自由的市場體系，讓合理的價格重新扮演在一個自由主義國家應當扮演的角色。

管制的觀念

我們可以很容易的把自由主義的觀念追溯到亞當斯密，但是「管制」哲學的起源就很難辨認。我相信把「管制」和「國父思想和民生主義」扯在一起是一種完全沒有根據的說法，很明顯的史實是在廿世紀後半葉，許多低度開發國家過渡到現代成長的過程中，多半都採納一種「市場」和「管制」混合的體制，不曾接受「國父思想」指導下的印度，選擇的公營企業包括鋼鐵、鐵路和銀行……其種類之繁多決不在臺灣之下。韓國則藉著類似「社會主義」的口號取締所有私立補習學校——在臺灣補校無非受到一些管制而已。而臺灣也從來沒採用過菲律賓的「最低工資法」，如果臺灣現在也有這種百害而無一利的「最低工資法」，受誤解的準是國父。國父也一定不贊成納稅人長期的給賠錢的國營事業貼錢！沒有「起色」老賠錢的生產事業，無論國營民營，讓他倒了算了，經建會過去列舉許多國營事業缺

乏效率的原因，可是沒人說經建會是違反「發展國家資本」的 國父遺教的「反叛」。我們雖然可以從許多角度去解釋管制哲學的起源，也許一本書都寫不完，可是必須提出兩件事。第一件就是前面提過的「國家觀念」在過渡生長時期的加強熱忱的民族主義思想的表現不止是抽象的一心一德的「全國的目的」，而是政府首長必需顯出具體的處理：「照顧」人民的意願。飛機失事、大專聯考、水災地震、少棒冠軍、過年過節、物價上昇，行政院長都必需有個「聲明」有個「管制」才算有個「關心」，連美國總統都這樣關心！問題是在開發國家中，這種「關心」常會漫延到政府必需「關心」每一家生產事業，拍拍他，獎勵獎勵，安撫安撫他，鼓勵鼓勵，管管它教育教育，把工商業當個小孩兒。國家主義在這種地方的表現是管制觀念第一個來源。第二件是仍舊是觀念的傳播和模仿的本能，也就是說混合制度在開發國家中流行大致是吸取了自由市場制度和蘇俄的計劃經濟制度的經驗以後綜合起來的觀念。

管制與干預的觀念，經過卅年的實際執行，大致上已被肯定。一項抽樣調查顯示，臺北的國立政治大學主修經濟學的學生，絕大多數贊成「公營事業」「福利立法」，反對「壟斷」反對「自由競爭」。大學生從小受到干預哲學的薰陶，早就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很難被大學的經濟課程所影響而改「觀」。

若是有人呼籲政府解除干預，特別是這種聲浪由弗利德曼（Milton Friedman）或是別的外國教授發動，官方很少這種從學術化或理性的立場去作辯白；通常是拿「不明國情」來「搪塞洋人」自我解嘲。可是說實話，我國的「國情」多少有一點神秘的色彩，因為誰都懶得給它下個明確的定義。也許「神秘」是對於「理性主義」最好的搪塞，可以一手蔽天的把一切經濟理論打倒，不過「管制」的神秘多少也有一點是因為「認生」或是「懼怕陌生的觀念所造成的不安全感」。

自由市場的運行

對當代的混合經濟體制來說，弗利德曼教授認為發展的成效和市場自由的程度

成正比。我想臺灣過去卅年的成功，主要的原因是「官方陣營」在執行發展政策時「言行不一致」，可能無心的採納了自由市場經濟，而充分的利用了私人企業家的創造的精力和天才。其實這是李國鼎先生和高希均博士，在一本即將出版的卓越著作中所論證的主題，他們在書中仔細的評估了卅年來的發展政策。臺灣的成功是因為能和對外導向發展的趨勢相配合，來輸出勞動密集產品，當然這種出口必須在我國完全不能控制的世界市場價格下競爭。在六十年代的初期，朝向自由化所作的改革（貶值與利率合理化）促使國內價格體系合理化。外銷退稅制度，更把所有的人為之價格干擾全部消除；人為的出口障礙更因加工出口區的設立而徹底消滅。這些實際的措施的運用，很巧妙的擺脫在國內到處泛濫的經濟干預，帶來製造的出口生意興隆，這是百分之百的自由市場制度的勝利。「自由陣營」唯一的遺憾是，管制學派不能從這些寶貴的經驗中吸取一個抽象的教訓。

結 論

知識份子的意見對於政策形成的影響力，可以用另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們舉最近在報章雜誌上有一些關於通貨膨脹的爭辯。對自由陣線而言，銀行體系和金融機構的自由化是唯一抵抗通貨膨脹的辦法。他們認為政府把利率壓低在一個人為的低水準上，就不能吸收儲蓄存款，因此必須藉助貨幣數量的擴張才能增加銀行投資放款。這一種觀念導源於「可貸資金理論」。另一方面，所有支持「官方陣線」的論調，基本上都是屬於凱因斯學派，認為「貨幣是一種財產」「利息是一種成本」，所以「低利率」有助於投資活動促使經濟繁榮。知識份子的意見爭辯最後總是經濟理論，概念的「好」與「壞」的問題而已。就像凱因斯所說的：無論是「對」，是「錯」，先入為主的意見總是那麼的有勢力，吸引了一大羣熱忱的支持者。

「傳統價值」和「主義」的理念的特性是它的「永恆性」，分歧和不一致的程度非常的低，因為人在感情上不能容忍異己。知識份子的意見就大不相同，因為它是「活着」的東西——也就是「可以死亡」的東西，這種意見的本身在一個鼓勵爭

辯的社會環境中可以澄清、傳播、生長和消失，人類的確是「先入爲主的意見的奴隸」，但是人類的可愛就是因爲人知道這件事而時時想掙斷這條無形的鐵鎖而得以解脫。人和螞蟻到底不同，民主政治之所以爲現代的制度就是在這種制度下，所有的「觀念鬥爭」可以在互相容忍的精神下公開講理的討論而得到一個好結果。這個好結果就是進步。這豈不就是人和螞蟻不同之所在？